

美国文学中基督教传统 的连续性：内在同构关系

Continuity of the Biblic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ner Co-structural Relationship

杨彩霞 中国人民大学

Yang Caixi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英文提要]

The three major them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reflect three essential themes in Christian thought: the individual's search for belonging in the midst of life's uncertainties; his search for the absolute in a relativistic world; and the retelling of an ancient theme in narrative form wherever possible, e.g. the Synoptic Gospels. The author observes a co-struc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biblical tradition, in their use of literary concepts, archetypes, themes, images and allusions, and even in rhetorical devices.

基督教思想是西方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活动产生诸多影响的一种主导文化因素。基于历史传统的原因，这种影响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文学中，基督教思想与圣经文学传统是创作中经常浮现的一个独特现象。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里蕴涵的丰富文学性决定了它对后来西方文学想象势必产生重大的影响，也确立了它在西方文学传统中所占的独特地位。

《圣经》几乎囊括了人类世俗经验的各个层面,这也是它不断被历代文学家用作述说故事、诠释生活、传递思想的工具的根本原因。叙事手法上,从《旧约》到《新约》是一部在叙事结构和情节铺垫上都极为连贯完整的作品,以《创世记》开始,到《启示录》结束,中间贯穿着人类犯罪、堕落和救赎的历史。《旧约》的内容在《新约》中不断显现,《新约》的叙述是对《旧约》的呼应和补充,二者构成了特有的语言符号和文学表述模式。时至今日,这种文学传统仍在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它仍然会保持着这一传统影响的强劲势头。

从基督教思想传统的视角来看,美国文学中保持着这种思想传统的连续影响,尤其是20世纪美国文学突出体现了人类堕落,亚当、夏娃受到上帝的惩戒,在人间苦苦奋争的这一《旧约》神话意象。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违背上帝的意志,他们对自由意志的滥用导致人类最终的堕落,使得亚当及其后裔——整个人类失去了上帝创世之初所具备的完美性,失去了天真,失去了和平,失去了乐园,并且永远堕入了一种充满斗争、劳作、痛苦、遗憾、悲观、失望和死亡的生活之中。这一内容与20世纪的社会现状有着很多类似之处,使得许多本身就与基督教文化和圣经传统发生着某种关联的作家在前者那儿找到了表述思想的一种重要媒介。他们以《圣经》的思想内容和语言结构为创作的根底,力图从远古的文化中追溯人类承受苦难命运的根源,借以说明自古以来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体验与感受,从而拓展作品表现的广度和力度。在构思与创作过程中,有的作家直接套用《圣经》创作的思路,借用其叙事结构,有的作家则隐性地运用《圣经》思想作为创作的文化根底,采用基督式的人物形象和《圣经》故事来影射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和事件,或褒扬或讽喻,达到强烈的艺术表达效果。这样直接间接地援引、引证或化用

《圣经》内容，不仅能够开阔作家们艺术创造的视野，拓展文学想象的空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阅读和欣赏层面的需要，熟谙《圣经》故事的读者会在心灵上同作者发生共鸣，达到强烈的艺术表达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学思想和表达手法的这种承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美国文学想象力的深度，并维持了其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

—

三百多年来，美国人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及其民族心态都经历了许多变迁，这些历史内容在美国文学想象里自然会得到程度不同的反映和再现。尽管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文学创作潮流和文学鉴赏口味会有所变化，“但是，如果从整体上看，美国文学要比西方其他伟大的文学在主题、情绪和表达手法方面都更具连续性”^①。这种连续性主要体现在表面多样性之下的统一性。从不同时期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来看，其中总是保持着美国文学传统的这一内在连续性，即展示美国人在新大陆上生存的努力以及发展的追求，表现美国人独特的民族内涵，从而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文学心理氛围，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张力通过文学想象这种媒介以独特的方式得以真实地再现。

从思想传统来看，这一连续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民族心理中蕴涵的基督教文化根基，概因如此，美国文学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与圣经文学传统的一种内在的同构关系。正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代表作家夏多布里昂（1768—1848）在《基督教真谛》

^① Heinrich Strauman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xvii. 3rd revised edition,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and Evanston, 1965.

里所述：“因为基督教提供了世间与天国的二元对比和作为完美象征的上帝，人可以在对天国的思慕中通过文学去创造和接近理想化的精神世界，从而获得自我的提升和超越。”^① 这一论述揭示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通之处，艺术和宗教寻求的都是人类的一种终极关怀，它们关注的是终极现实与人的命运问题，也为文学中显现的基督教文化内容提供了思想上的根基。

综观整个美国的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一个《圣经》神话意象在这块新大陆上的浮现。18世纪是早期殖民者开垦原始荒地的时期，19世纪的美国人正是新大陆上的亚当形象。他们生活在这个伊甸园之中，充满活力，相信自己就是上帝的特选之民，这片新大陆就是《圣经》里记载的上帝赐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上帝赐予他们的人间“乐园”。时至20世纪之初，一种不祥的乌云似乎开始笼罩这些上帝的子民，像伊甸园里亚当、夏娃的被逐一样，这是美国人“失乐园”的时代，因为在征服这片乐土的过程中，他们同时也以自己意识不到的方式亵渎了这个乐园。路易斯·欧文斯认为：“可以把美国的殖民过程看做永远向西扩展寻找伊甸园的过程，而这个伊甸园似乎总是在早期殖民者的眼前朝后退去。这一过程就成了在寻找乐园的时候掠夺乐园的过程。”^② 这一问题在美国历史和美国文学里不断回响。文学作为对人类处境反应最为敏感的工具，自然会与这一基本情绪保持某种内在的关联。

海因里希·施特劳曼在《20世纪美国文学》一书里把美国文学的主题归结为三类，他认为：“从19和20世纪的文学大背景

^①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223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② Louis Owens, *The Grapes of Wrath, Trouble in the Promised Land*,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9, p.47-48.

来看，这种文学内容发展成为美国文学的三大显著主题，即：在对个体的本质及其归属的根本不确定感的基础之上对身份的寻求；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个显著主题是探索某种绝对价值观，无论这种价值观是道德的、社会的抑或是审美的；进一步的必要后果就是，在形式上进行实验的永远潜在意愿。”^① 这一概括不仅勾勒出了美国文学所反映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关涉到作为美国社会思想基本组成部分的基督教观念。简言之，美国文学的三大主题亦即是基督教观念的三种内在性质：在个体的不确定性之中寻求归属；在相对化的尘世之间追索绝对；在任何可能的叙事框架里不断复述一个最为古朴的主题，有如可以“对观”的福音书。由此可见，美国文学思想与基督教观念的同构关系，从文学观念、原型母题、意象典故乃至修辞手段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与圣经文学传统保持着某种内在的同构关系。

自古以来，文学作品所关注的焦点无非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蕴涵于其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而生与死、爱与恨、灵与肉、情感与理智、欲望与意志力等文学性的二元张力，其实恰好折射着人类对有限与无限、时间与永恒、“是”与“在”的宗教性关怀，从而宗教往往最集中地蕴集着文学作品用之不竭的永恒主题。宗教和文学在神性的终极关怀和世俗的社会关怀两大信念的支撑下，也许自身就体现着某种深层的同构。因此，在西方文学创作中，作家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圣经文学传统进行不同程度、各个视角的借鉴和运用，希冀借此来探究他们试图表现的人类发展及其命运前途的永恒内容。

由此可以辨识的第一种逻辑结果，即在于文学主题与圣经母

^① Heinrich Strauman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xviii.

题的同构。著名意识流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在其创作的《芬尼根们的觉醒》(*Finnegans Wake*)一书中塑造的艾尔威克一家四口的艺术形象,也许就是企图以一部现代亚当家史说明:全人类的历史就是由爱与恨、善与恶这两类矛盾的感情交织而成的。笼统地讲,可以说文学作品无外乎就是反映此类对立和矛盾的社会现实,善恶二元模式的原型实质上就是基督教的上帝和撒旦。更有深意的是,作为意识流创作手法的代表性人物,乔伊斯还把小说的开头和结尾的两词连接为一个句子,借以说明这种历史的循环往复,永远轮回,人类难以摆脱这一悲喜交加的历史“怪圈”。美国文学里,这种以古老的原型母题揭示现实的写法也有着传统上的连续性。19世纪的文学创作在观念上也体现着与《圣经》思想的内在关联,19世纪的经典作家如霍桑、麦尔维尔的小说里对宗教内容的利用和批判成为其文学想象的重要内容。比如,“麦尔维尔一生关注人、自然、宇宙与神的关系。受19世纪自然神论的影响,《白鲸》表现了约伯式的对神的正义性的质疑,并怀疑加尔文主义有关犯罪与救赎的观念。……他为《白鲸》的主人公起名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原型来自《创世记》中被亚伯拉罕遗弃的夏甲之子以实玛利,这个‘被抛弃的流浪者’原型反映出作者本人与作品主人公的密切关系,也暗示了人类受造物主遗弃的可悲命运。”^①20世纪的美文学创作,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围绕罪恶、忏悔与救赎的主题,表现出灵与肉的冲突、罪与恶的膨胀,并表现出上帝神性光芒的恩赐与感召。这类文学作品借基督教神话为原型,讥讽人类历史神话中的不断“返祖”现象,以古老的记载向堕落的人们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

^①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367页。

19世纪美国文学已经显现出与基督教观念的某种同构关联，而“20世纪西方文学对基督教神学观念的深层体现，往往表现为直接参与基督教精神的重新构合”^①。20世纪美国文学创作在思想观念上体现着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实质内涵。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以西班牙内战为小说的背景，书名借用了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邓恩的布道词句，“因为我同整个人类是一体的，因为任何时候你也不要问，钟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其主题所表达的是一种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反映了海明威对个人与人类整体相互关系的积极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意识。这与耶稣基督宣扬的基督教博爱与关怀精神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圣经文学》一书中，利兰·里肯对《圣经》中蕴涵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他首先分析了圣经文学的一些重大主题，比如旅途主题、寻求主题、死亡—再生主题、创始故事主题以及替罪羊主题。这些原型模式构成了后来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想象的基本出发点，成为历代文学经典表现思想的重要母题；上述美国文学的三大主题也与之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美国文学创作的许多重大主题都与《圣经》有着渊源之系，并在创作思想上与圣经母题保持着直接的同构关系。有人曾把美国文学戏称为宗教文学写作。在早期的文学创作中，许多著作本身就是宗教写作，尽管算不上严格意义的文学创作，其中的宗教因素却非常明显。其后的文学创作要么直接图解基督教教义，要么借鉴和运用《圣经》典故或意象进行文学表述，部分原因是“因为《圣经》是大量经济盘剥和束缚故事的来源，作家们使用类型并列的形式强调受奴役的主题，把殖民者遭受的苦难与以色

^①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263页。

列人的苦难加以对比”^①。文学所力图表现的主题与《圣经》记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围绕人们对物质和精神追求的历程所作的生动描述,是人类自身发展过程中追求精神洗礼和心灵救赎的不懈努力。美国一些作家直接借用圣经母题来象征上帝子民为了获得应许之地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无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精神荒原”的描写,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迷茫的一代”的追忆,实质上都反映了美国作家在精神追求上的尝试和努力,在文学精神上与宗教思想有着殊途同归之感。

人类历史或许真的是在不断地轮回重复,文学主题总是表现出人类大体相似的普遍关注,即在文学艺术世界里再现古老的主题。重新构思的《圣经》传说成为讲述一个不同故事的借口,受到诸如政治的或是审美的这类时代需求的制约和驱动,而《圣经》传说在其中只作为精神和灵感的来源。在运用古老的《圣经》传统的时候,作家们实际上关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圣经故事充当着当代事件的对应物,或充当一种原型结构,用来说明人类所有的经验,使得现在更为可信,生活的窘境更能为人接受。”^②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学主题与圣经母题的同构可能下意识地表述着一层更为深刻的动机。特别是在美国文学之中,圣经母题往往是被用以展示一种典型的集体幻想,并通过其中展示的同构关系使这种美国式的集体幻想得以合法化,甚至带有某些神圣的意味,从而成全“新的上帝之民”之梦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使命感。

20世纪以来,天灾人祸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前所未有的创伤,人类堕落的信条对西方文学确实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一定程

^① Emory Elliott, *Puritan Influenc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rbana, Chicago; London, 1979, p.120.

^② Emory Elliott, *Puritan Influenc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1-2.

度上，文学想象虚构的世界为人们那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抚慰和宽心。这类主题以这种或那种的隐性方式在美国许多伟大作品中得以再现，成为其文学想象重要的思想源泉和根底。美国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圣经》思想对其虚构世界的作用，伊甸园的失落与重建成为人们精神追求的最高向往。从世俗的角度出发，人们精神上的流浪又可以从该隐的故事里找到渊源，本质意义上，世上每个人都处于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流浪状态，这是人类骚动不安的灵魂的象征。

二

文学主题的再现必然与反映这一主题的原型叙事结构有着直接的关联。里肯认为：“原型是象征、性格类型或者文学当中经常出现的情节主题。一位批评家把原型称之为‘任何对于人类境况那些永恒方面的反应的古老模式’。这些原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意义，对人类体验中最为根本的内容有着极大的兴趣。”^①“《圣经》的原型内容不仅使它具有整体性，而且赋予其普遍性。原型表达了人类经验中最为常见、最为根本的内容。用诺思洛普·弗莱的话来说，‘有些象征是人们共有的事物的形象，因此具有一种可以无限潜在的传达力’（《批评的解剖》，99页，原注）。因为原型不仅属于《圣经》，而且还是文学自身的基本构成要素，所以圣经文学的原型使我们能够把它与其他文

^① Leland Ryke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Michigan: the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76, p.22. 关于引文部分，参见 Leslie Fiedler, “Archetype and Signatur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graphy and Poetry”, in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ed. Marlies K. Danzinger and W. Stacy Johnson, Bos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61, p.268.

学联系起来。即使是在圣经文学反转或颠倒原型的通常意义时,情况也是如此。”^① 正是因为原型本身就是文学的基本构成,圣经文学与其他世俗文学的关联就成为潜在的可能,也表现为文学叙事与《圣经》原型结构的同构关系。

叙事结构与主题表述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叙事结构成为思想表述的决定性因素。圣经文学里的“U型结构”(U-shaped Structure)是其叙事的主要框架,情节处理在这一框架衬托之下显得跌宕起伏,这也是《圣经》极富文学性和戏剧性的重要标志。《创世记》里约瑟的故事就蕴涵这样一个基本叙述框架,主人公在遭受极大灾难之后,最终以全家团圆的喜剧结束。这也是上文提到圣经文学的“寻求主题”的具体表现。波提乏的妻子撒谎,使约瑟成为无辜的受难者,是另一个主题,即“受难的仆人”的再现。《约伯记》是《旧约》中三部极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其他两部是《路得记》和《以斯帖记》),故事情节的发展跌宕起伏,出乎人的意料,其文学叙事也呈上述框架。尽管大部分笔墨用来描写约伯悲剧生活的细节,但是整部作品却构成了通常定义上的喜剧情节,即U型结构,故事开始是兴盛,然后降至悲剧,突然升到幸福的结局。耶稣从坟墓里复活是《新约》福音书里的高潮,成为整部《圣经》“U型结构”上的最后一环,表现了耶稣基督战胜邪恶的最终胜利,呈现了福音书的喜剧色彩。里肯认为:“耶稣受难的故事不仅是各福音书的高潮,而且也是整部《圣经》的高潮。这是圣经文学其他部分前后指向的中心。它实现了《旧约》里的律法和预言、《旧约》类型(各种预示)以及受难仆人的圣经原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代表的代替赎罪也是《新约》里弥漫的‘福音’的基础,

^① Leland Ryke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 p.25.

是新约神学整个大厦的根基。”^① 其他故事里贯穿的“犯罪—堕落—拯救”的主题也是“U型结构”的又一重要表现。

《圣经》叙事的独特性尤其适合文学写作，强调以神学为中心，表述善恶之间的连续不断斗争的本质。《圣经》故事反复赋予上帝价值和荣耀，而在世俗文学里此类思想往往体现在主人公身上。《圣经》叙事的特征使其为文学创作提供原型模式成为可能，圣经文学叙事围绕上帝展开叙述，世俗文学则聚焦于小说的主人公身上。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的人生经历和心理体验通过这一框架展示出来，也表现出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像任何展现人类经验的文学艺术一样，美国文学在相当的程度上迎合了这一古老的叙事传统，小说情节的曲折性，使得作家可以更深刻地挖掘人物的深层心理，取得强烈的艺术表现效果。20世纪美国文学中对《圣经》叙事的援引也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运用的犯罪—堕落—救赎的叙事结构、《押沙龙，押沙龙！》中的堕落—毁灭主题都是圣经文学叙事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表现。纳撒尼尔·韦斯特（Nathaniel West, 1903—1940）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蝗灾之日》（*The Day of the Locust*, 1939）书名取自《出埃及记》，根据摩西要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降蝗灾于法老的原型故事而作。蝗灾作为厄运和灾难的意象，隐喻着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文化艺术，借此反讽现代生活的平庸和粗俗。

三

《新约》是使用意象和象征手法最多的地方，耶稣的讲话充

^① Leland Ryke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ible*, p.290.

满暗喻和象征, 同时也有众多充满生命力的意象, 如活水 (《约翰福音》, 4: 10)、生命的面包 (《约翰福音》, 6: 35)、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 8: 12) 以及好牧人 (《约翰福音》, 10: 11) 等。在《圣经》寓言故事里, 上帝的国被比喻为田地、芥末子、珍珠、葡萄园、宴会和婚宴。基督把自己喻为羊的门, 用牧羊人象征自己在十字架上替人赎罪的形象。“一个好牧人”成为文学中反复出现的代表完美事物的启示性比喻。《圣经》中的意象和象征极富文学性, 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符号揭示出人生的丰富性内容, 因而成为作家们用之不竭的文学修辞手法。

19 世纪的美国文学创作中, 作家们已经开始关注到基督教的基本观念以及《圣经》的艺术特征, 并运用在文学表述的基本手法上。霍桑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除《红字》外, 霍桑的其他作品也具有这种特点: 在刻意表现基督教关于罪恶与人类本性的观念时, 艺术上大量借鉴《圣经》中的意象和象征。……可见, 作为美国文学第一位真正伟大的作家, 霍桑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自基督教及其《圣经》的影响”^①。在 20 世纪的一些美国小说里, 作家们也在不断利用此类意象和象征, 表现作品的深刻内涵。韦斯特的成名作《孤心小姐》 (*Miss Lonely hearts*, 1933) 里便充满了浓郁的讽喻意义。《孤心小姐》的问世, 正值经济大萧条将美国社会搅得天昏地暗之时, 作品嘲讽了狂乱的时代、病态的社会和异化的人性, 利用密织的意象来隐喻畸形的社会与人生。当时生活正如作家笔下的象征性画面: “天空中没有安琪儿, 没有燃烧的十字架, 没有嘴里叼着橄榄枝的鸽子……”主人公孤心小姐是 20 世纪美国的牧师, 这一称谓具有特定的寓意。小说把主人公与耶稣并列起来, 形成了鲜明的对

^① 梁工主编:《基督教文学》, 366 页。

照。“孤心小姐”具有浓厚的基督情结，希望以基督教的“博爱”来解决现实问题，摆脱人生的苦恼。她幻想过天国降临的动人场面，最终却因爱心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小说极富象征性的结局，反映了作家对基督教博爱主义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与之对应的对照性描写是毫无表情的耶稣像，作为装饰品被钉在墙上，它表明在由铁锈和人体排出的物质组成的“沙漠里”，根本没有爱和情感的容身之地。这类主题在小说里以反讽的形式道出，包含着深深的苦涩和无奈。

许多美国小说利用《圣经》典故作为其标题，揭示作品的深刻内涵。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7)书名取自《传道书》，“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传道书》1: 4~5)。福克纳的《去吧，摩西》书名源自《出埃及记》。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 1862—1937)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 1905)是她在美国写作的最后一本书，书名取自《旧约》的《传道书》：“傻瓜的心是在快乐之家的”。它对美国上流社会表面上的风雅是个有力的反讽。约瑟夫·海勒的《上帝知道》借用大卫和所罗门的原型意象进行了反讽式描述，借以嘲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灵苦闷和精神危机，描绘出一幅文化和精神沙漠的意象。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也以虚拟的手法讽刺了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人们道德的沦丧。由此可见，作家们利用《圣经》典故和意象，对人性美丑和善恶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讽。

四

由上述可见，采用宗教神话进行反讽叙述，“反其意而用

之”，是美国作家文学想象的一个重要内容。反讽是文学叙述的一个主要手法，以讽喻式的形式对生活现象进行深刻的揭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创作，在总体上表现出文学反讽与《圣经》背景的同构关系。对于海明威的《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 1925），当代美国评论家菲尔蒲·扬认为，小说标题的含义是对英国国教《常用祷告书》里名句的讽刺性引用。祷告书说：“主啊！愿此时赐我们平安。”而小说最明显的描绘是“完全没有平安”。小说里每篇故事都有一个隐喻式的标题，以一种穿插性对位结构，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插进表现战争、斗牛、死刑场面的内容，整部作品弥漫着战火硝烟，毫无平安之感，到处充满暴力、流血和死亡。辛克莱·刘易斯以描写美国中西部的“乡村毒菌”、揭示小镇生活的陋习而享誉国内外，他的文学创作成为美国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象征和艺术缩影。正如一滴水可以窥见整个世界，刘易斯虽然描写的是乡村小镇生活，但实际上他的作品辐射的社会生活十分广阔，寓意深长。“上帝创造大地，人类创造城镇，魔鬼创造了乡村。”对乡镇生活的这一独特理解，使刘易斯的小说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对美国乡镇生活的平庸和阴暗面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在《艾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 1927）一书里，刘易斯着力刻画了一位灵魂丑恶、手段卑鄙的教士形象，集中揭露了美国宗教生活的伪善、欺诈和商品化，达到了漫画式的讽刺效果。与之相对应的是，在以凯瑟琳·安·波特为代表的描写中西部拓荒生活的作家笔下，乡镇生活则是蕴涵道德理想的净土。凯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 1890—1980）的《绽开的犹大花》（*Flowering Judas*, 1930），以《圣经》中犹大吊死在橘红花树上的传说，隐喻地批判了对革命理想、宗教、爱的背叛行为，从而指出人类生存的价值就在于有真正的信仰和爱。作家运用精巧而蕴涵强烈讽刺意义的宗教意象表达自己的道

德判断，强化小说艺术感染力，从而使文学思想与宗教观念达到了和谐的共存。

结 语

美国文学创作观念与基督教思想有着无法否认的渊源关系，而且文学观念与宗教内容和神学思想的内在关联有着传统上的连续性。可以看出，美国文学可以在《圣经》叙述中发见其想象的本质性内容，因为文学对于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与表述在观念上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之关怀，这与宗教意趣其实有着同样的功用。